

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演化及其对增收的贡献度分析

——基于贵州省的调查研究

汪磊 汪霞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农户增收是破解新时期“三农”问题的关键。促进农户增收关系到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长远生计,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关键环节。分析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剖析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的贡献大小,是激活农户生计资本的内生动力,精准配置扶贫资源的重要前提。从外部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引致了农户以土地为载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向以市场为依赖的生产生活方式演化;从内部来看,搬迁后农户生计资本增量更加明显,内部构成更加均衡。在此背景下,定量揭示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的贡献作用,进而提出改进的对策与思路,是优化内生式扶贫措施,增强农户增收能力的重要着力点。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 生计资本; 搬迁农户; 农户增收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6)06-0093-06

随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及《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等扶贫政策性文件相继出台,作为“五个一批”中的重要一环,易地扶贫搬迁被誉为是解决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贫困人群脱贫问题的有效手段,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当头炮”和重中之重。在易地扶贫搬迁中,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标,增收是途径。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必须解决好搬迁农户的增收问题,能否获得稳定的收入关系到易地扶贫搬迁的成败。贵州集生态脆弱区、民族聚居区、大石山区、革命老区于一体,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范围最广、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的省份。“十三五”时期,贵州易地扶贫搬迁人数高达130万,占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总数的26.37%。鉴于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典型性和代表性,2016年8月22日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在贵州召开,汪洋副总理强调易地扶贫搬迁的关键是要增强搬迁群众后续发展能力。如何增强搬迁农户的后续发展能力,尤其是农户增收能力,是贵州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以生计资本为分析视角,以易地搬迁为研究背景,以贵州搬迁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的总量变化,剖析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的贡献作用,继而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便为其他省区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增收问题提供有益的方法借鉴。

1 农户增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农户增收是一个涉及农户、企业、政府等多个利益主体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多，过程较复杂。国外学者的早期研究认为农业产出的增加是农户增收的关键。传统理论认为农业产出是农业各要素投入（劳动、资本、土地）的函数，还包括农业技术提高、农业技术扩散等。后来学者发现非农业收入逐步成为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并由此引起劳动力转移以及劳动力市场调节等问题的研究。此外，部分学者还分析了政策扶持、产业结构、城乡差距以及市场风险等因素对农户增收的影响。

农户增收同样吸引着国内众多学者的兴趣，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1）从政策层面来看，由于农业具有天然的弱质性和风险性，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支持。部分学者从土地政策、粮食直补政策以及财政金融政策等层面分析政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2）从组织结构来看，不同的组织结构对农户增收的贡献作用也不尽相同除家庭维度外，更多学者偏重于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析组织结构对农户增收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从产业维度来看，部分学者从产业链的视角出发，分析发展高附加值的特色种植业与养殖业对农户增收的促进作用，强调特色产业对农户增收的带动作用。（4）从城镇化带动来看，有的学者认为城镇化过程带来的政策红利（农地制度、户籍制度和支农政策）为农户增收带来了机遇，实证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有效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5）从资本视角来看，更多的学者偏重于分析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对农户增收的影响，但很少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的贡献作用。

由上述分析来看，已有文献大多着眼于农户增收的宏观层面的静态分析，并且以定性分析居多，易于忽略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的内生驱动作用。尤其是从生计资本的微观视角出发，结合精准扶贫背景下的易地扶贫搬迁动态分析搬迁农户增收问题的研究还比较鲜见。

2 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的比较分析

生计资本是农户增收的物质基础。生计资本的规模性、多样性以及均衡性制约着农户增收的能力和途径。“十三五”时期，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对象瞄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地区农户，对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以及边远山区等生存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等区域的贫困人群实施扶贫搬迁。2016年贵州省实施的土地易地扶贫搬迁30万人共307个安置点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计划投资180亿，已完成67.6亿元。正如资源禀赋决定着企业竞争能力的优劣，生计资本决定着农户增收能力的强弱。对农户而言，由于搬迁后的生产生活条件在空间位置、交通区位、市场环境、政策扶持以及金融支持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户生计资本的总量及其结构也随之改变。本文应用2016年贵州省铜仁、遵义、黔西南以及毕节四个市州的156户移民搬迁前后的跟踪调查数据，分析农户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总量变化，定量研究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的贡献作用。由于英国国际发展署提出的生计资本研究框架应用范围最广，认可程度最高，因此本文借鉴该分析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五种类型，借此分析搬迁农户五种资本的前后变化。

表 1 搬迁前后农户自然资本总量变化

	搬迁前	搬迁后	变化趋势
人均耕地面积(亩)	1.37	0.25	-1.12
耕地质量得分	2.31	3.86	1.55

2.1 自然资本的演化

耕地是农户基本的生产资料以及最重要的生存资料，是农户自然资本的重要构成。由于贵州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地形破碎，人均耕地面积仅有 1.67 亩，耕地质量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考虑到搬迁农户除耕地外其他类型的土地资源偏少，本文仅分析耕地的变化（表 1）。具体而言，通过引入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两个指标来刻画自然资本的变化，前者反映了耕地的数量，后者反映了耕地的质量。受地形、气候、灌溉条件、耕作方式和原有农作经验等因素影响，本文将耕地质量 1 评价划分为 5 个等级，即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和非常差，分别赋值 5、4、3、2、1。调查发现，由于迁出地本身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滞后，物流交通不畅，加之受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物流成本、管理成本、劳动成本以及时间成本等因素制约，62.3%的搬迁户最终放弃了原有土地的承包权或使用权。搬迁前后农户自然资本的变化如表 1 所示。从数量上看，搬迁后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 81.75%；从质量上看，搬迁后农户的人均耕地质量得分提高了 67.09%。

表 2 搬迁前后农户物质资本总量变化

	搬迁前	搬迁后	变化趋势
户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136.00	80.50	-55.50
住房质量得分	1.52	4.35	2.83

2.2 物质资本的演化

搬迁农户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贫困程度深，房屋是其最主要的物质资本。从住房面积来看，根据调查数据计算得出，搬迁前平均每户的住房面积为 136.3 平方米，搬迁后户均住房面积为 80.5 平方米，平均减少了 40.8%。从质量来看，由于搬迁前的住房大多属于土木、砖瓦或砖木结构的危房，加之位置偏远，价值较低。搬迁后的住房属于政府统规统建或者购房安置，大多为砖混结构，住房质量明显提高。由于安置点大多依托城区、景区与产业园区，地理区位优势，市场化程度高，物流交通便捷，人口聚居度提高，住房或商铺的市场价值明显提高。以贵州省松桃县普觉镇为例，该镇借助“易地搬迁+小城镇”模式，城镇规模由过去 1.8 平

方公里扩展到 4.5 平方公里，带动近 3000 人入驻，城镇人口由过去 5000 多人增加到近万人，助推了产业集聚，活跃了市场交易。农户借助以房屋等物质资本，通过自主经营、房屋租赁方式极大地增加了财产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同耕地一样，本文将住房质量按 5 个等级分别赋值 5、4、3、2、1。根据对搬迁户的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出搬迁前后农户户均住房面积及住房质量 M 得分（表 2）。由表 2 可知，搬迁后农户的户均住房面积减少了 40.80%，但住房质量得分提高了 186.18%。

表 3 搬迁前后农户金融资本总量变化

	搬迁前	搬迁后	变化趋势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 856	4 236	1 380
融资渠道评价得分	2.11	4.82	2.71
政府直接补贴得分	1.82	3.57	1.75

2.3 金融资本的演化

金融资本主要指用来实现搬迁户生计目标的资金来源。本文通过人均可支配收入、融资渠道、政府直接补贴三个方面予以分析。调查数据表明，搬迁后农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 48.32%；政府直接补贴方面，按照贵州现行的补贴政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建（购）房补助标准是 2 万元/人。签订旧房拆除协议并按期拆除的，人均奖励 1.5 万元。完成旧房拆除，原有宅基地复垦，经验收合格后，按人均 1.5 万元奖励，搬迁后按四口之家计算，农户家庭可以获得来自政府部门的直接补贴 20 万元。融资渠道方面，贵州省推出“特惠贷”精准扶贫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专门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 5 万元以下、3 年期以内低利率、低成本、无担保、无抵押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对帮助搬迁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以及其他特色产业予以金融扶持。显然，搬迁后农户家庭可以获得更多的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补贴以及贷款扶持，金融资本的增加趋势十分明显（见表 3）。

表 4 搬迁前后农户社会资本总量变化

	搬迁前	搬迁后	变化趋势
实际帮助支持网规模得分	2.16	3.85	1.69
社区居民内部交往得分	1.22	3.49	2.27
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分	1.33	4.25	2.92

2.4 社会资本的演化

社会资本指农户用来实现生计目标的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搬迁之前，大多数农户居住在深山、荒漠化、地方病多发的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的偏远地区，农村留守的大多是儿童与老人，空巢化严重，人际关系简单，社会资本存量极低。搬迁之后，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组建了农民种植业合作社、农民养殖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以及道德大讲堂等非正式组织。这些非正式组织对吸纳农村劳动力，汇集闲散资金，调整人际关系，净化社会风气，整合相关资源等起到了很好的纽带作用。如贵州省六盘水市的易地扶贫搬迁，通过组建不同类型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借助“三变”模式（资源变股份、农民变股民、资金变股金），将原来分散的个体形成彼此合作的组织，进而动员搬迁户广泛参与安置区小城镇、景区、园区建设，通过谋划农业发展、产业调整、土地流转等方式加快了农户之间的融合，提升了社会资本总量，极大地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因此，搬迁后农户的社会资本总量得到显著增加，从而进一步促进和优化了其他生计资本的合理配置。本文通过实际帮助支持网规模、社区居民内部交往、农民专业合作社三个方面予以分析，结合跟踪调查数据，计算出搬迁前后农户社会资本的变化值（见表4）。

表 5 搬迁前后农户人力资本总量变化

	搬迁前	搬迁后	变化趋势
健康状况评价得分	1.56	3.23	1.67
技能水平培训得分	1.63	3.82	2.19
文化程度评价得分	0.09	0.09	0

2.5 人力资本的演化

人力资本是农户生计发展的基础，搬迁户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技能水平、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三个方面。易地扶贫搬迁之后，由于生产生活环境的变化，使得农户完全摆脱了依赖土地资源的传统生存方式，导致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户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商品交易市场、房屋租赁市场等实现就业，从而获得新的谋生方式，而此类生计方式都对农户的专业技能，劳动能力以及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构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从资金、技术、劳动力以及信息等层面实现了由分散向集中的演化。借助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方式实施统一收购、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统一管理，而这些都对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以及财务管理等专业技能提出了较高的需求。实际上，由人社系统、扶贫系统等不同政府部门为农户提供的就业培训、岗前培训等职业技能培训已经常态化机制化。该类培训针对性强、时效性强、规模性大，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实需求，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总量。如 2016 年贵州省黔西县雨朵镇与贵阳利美康、毕节鹏程等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开设培训班两期，对 126 名搬迁户进行以养牛、香菇种植为主的技能培训，有效提升了专业技能，农户增收效果明显。根据跟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的相关数据参见表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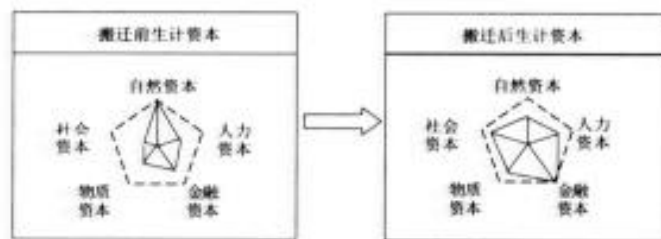


图1 搬迁前后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的对比分析

上述定量分析表明：（1）从生计资本的总量看，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自然资本（土地资源）总量明显减少，而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总量均在增加，尤其是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的增量显著；（2）从生计资本的构成看，除自然资本外，其余四大资本之间的增量相对均衡、构成更加合理，生计资本多边形更加趋向平稳，有利于农户增收能力的提高以及增收途径的多元化。根据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会同第三方机构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搬迁移民居住条件普遍改善，移民子女全部实现就近入学，农户收入明显增加，2014 年人均增收幅度高于全省农村 6 个百分点。

概括而言，易地扶贫搬迁导致贵州省农户生计资本由原来的有形资本逐步向无形资本转化，由原来的静态资本逐步向动态资本转化，由资本之间的碎片化共生向协同化发展转化。这种农户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总量变化可参见图 1 所示。

3 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的贡献度

生计资本是搬迁农户资源占有情况的具体体现，直接影响着农户增收的能力和增收途径。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状况是按照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2300 元的标准来确定的（2011 年不变价）。统计中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指农户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等获得的收入，经营性收入指农户家庭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收益，转移性收入就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对于农户而言，显然，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基于对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增收的跟踪调查，以及对贵州省人社厅负责人、市（州）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负责人、贵州大学研究扶贫问题的相关学者和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代表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借助德尔菲法，定量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贡献度的大小，形成如下结论。（1）对于工资性收入而言，主要是通过外出务工的方式获得相应的收入。而务工的类型、从事的行业以及收入水平与个人的技能水平高度相关，同时由于外出务工具有随机性、盲目性、无序性，需要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来提供相关信息，因此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较大。（2）对财产性收入而言，主要是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其影响较大，比如说保留原有土地的农户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同时，部分移民安置点靠近城区、景区或

产业园区，搬迁户的自有住房或商铺可以通过自主经营或者租赁来获得财产性收入。（3）对经营性收入而言，一方面需要重点培育各类要素市场，尤其是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市场、农产品交易市场等的培育；另一方面，对农户自身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提出了较高要求。经营性收入需要依托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来获得持久性增长。（4）对转移性收入而言，主要是与政府的扶贫政策高度相关，只有被纳入建档立卡范围的搬迁户才可以获得政府相应的补贴。

结合上述分析，基于资本和收入两个维度，结合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跟踪数据，定量揭示的生计资本类型对农户增收的贡献作用如表 6 所示。各类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由大到小的贡献度排序是：人力资本（13 分），金融资本（11 分），社会资本（10 分），物质资本（9 分），自然资本（7 分）。

表 6 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贡献度得分

	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经营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贡献度得分
自然资本	•	• • •	• •	•	7
物质资本	•	• • • •	• • •	•	9
金融资本	•	• • • •	• • • • •	•	11
社会资本	• • •	• •	• • • •	•	10
人力资本	• • • • •	• • •	• • • •	•	13

说明：将生计资本与收入之间的贡献度划分为 5 个层级，1 个 • 代表 1 个层级，表示 1 个得分，• 越多，表明得分越高、贡献度越大。

4 增加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收入的对策建议

4.1 培育要素市场，发挥资本优势

根据图 1 的分析可知，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依赖土地资源为主向依赖要素市场为主的趋势转变。尤其是搬迁农户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总量增大以及资本构成比例的优化（见表 1-表 5），使得农户增收途径非农化的特征十分明显。因此，通过培育要素市场，尤其是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以及农产品专业市场等，充分发挥生计资本的优势，是顺应农户增收途径非农化趋势的重要举措。具体而言，通过培育和壮大劳动力市场，将搬迁农户的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转化为工资性收入，通过培育和壮大土地流转市场，将搬迁农户的自然资本转化为财产性收入，通过培育和壮大房屋租赁市场，将搬迁农户的物质资本转化为经营性收入，充分发挥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的促进作用。

4.2 提升人力资本，拓宽增收渠道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农户增收的关键是人力资

本问题。由表 6 可知,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的贡献作用明显。“三农”的主体是农民,人力资本作为生计资本中的第一资本,对农户增收的全面带动作用十分突出,应该予以重点关注。因此,贵州省相关政府部门应该结合“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以及“雁归工程”等专项服务活动,全面整合当前分散的就业培训资源,如将人社系统的就业扶贫技能培训与扶贫系统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整合起来,加大对搬迁农户培训的力度和频次,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具体实际,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增强农户的专业技能,培养新型农民,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4.3 优化资本组合,分散系统风险

搬迁后,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生活模式意味着农户必须面对市场的系列风险。这里既包括劳动力市场风险、商品市场风险,还包括租赁市场风险。实际上,单一类型的生计资本衍生的增收途径会面临着巨大的系统风险。因此,为了有效规避或分散市场变化引致的系统风险,必须组合优化不同类型的生计资本,实施多元化战略,如组合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组合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这里的组合优化包括两个层面:微观层面实现个人技能多元化,即结合搬迁户的需求和偏好,有针对性地拓宽农户专业技能技术培训范围,尽量涵盖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实用技术,以及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非农业就业技能,由此拓宽搬迁农户的市场就业面,分散因就业市场波动所引致的系统风险;宏观层面实现组织类型多元化,即不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结合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特点,组建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供销社、劳务输出等多种不同类型的农村集体经济,以应对不同商品市场波动所带来的系统风险。

5 结论

当前,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增收的政策措施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安置模式选择以及扶贫项目建设等硬件因素。实施过程中往往将搬迁农户同质化,就业问题外部化,忽略了微观层面的农户增收过程中自身的内生动力。而生计资本正是决定着农户内生动力的重要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生计资本作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具有很强的合理性。本文借助实地调研法、深度访谈法以及德尔菲法,定量刻画生计资本对农户增收的贡献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及金融资本对进一步提高农户增收能力、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维持农户长远生计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当然,如何通过收集关于生计资本与收入水平的微观数据,借助定量分析模塑刻画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验证本文所得相关结论的合理性,是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DOUGLA P. H.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once again: its history, its testing, and some new empirical valu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6(5):903-915.
- [2]FAN S, PARDEY P. G. Research,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1): 115-137.
- [3]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 New York: Free Press,2003.
- [4]KUNG J. K. Off-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emergence of land rental markets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 conomics, 2002 (2) : 395 -414.
- [5]周兢.土地政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6(3) :57-60.
- [6]赵昕.粮食直补政策与农户增收问题研究[«!].财政研究,2013(5) :51-54.
- [7]陈雷生•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014(6) :742-747.
- [8]茹玉,林万龙•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对农民农业增收贡献的比较[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6(5):81-87.
- [9]刘瑞荣,刘日志•对万安县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户增收问题的思考[J].金融与经济,2005(11):76-77.
- [10]赵翠萍,任淑荣.从家庭经营收入透视河南农户增收问题[J].河南农业科学,2004(3) :20-22.
- [11]张晋华,冯开文,黄英伟.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农户增收绩效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2(9):36-40.
- [12]苏群,陈杰.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稻农增收效果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4(8) :93-99.
- [13]王旭光,浦纯钰•产业链延伸视角下农民增收模式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6(8):2174-2177.
- [14]李琳,邱宏波.陕两洛南特色产业奠定农户增收基石[J].瞭望,2010(35) :55.

- [15]李子联. 新型城镇化与农户增收: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J]. 经济评论, 2014(3):35-38.
- [16]彭红碧. 新城镇化影响农户增收的内在机理及其现实启示[J]. 理论导刊, 2016(3):89-94.
- [17]潘文庆, 吴梦迪. 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的广东农户增收实证研究[J]. 南方经济, 2014(8):124-128.
- [18]林育芳. 农户增收的金钥匙: 优化分工与提升人力资本——以泉州市为例[J]. 调研世界, 2011(8):49-52.
- [19]贺喜灿, 周绍森. 人力资本提升对农民长效增收的影响及对策[J]. 求实, 2009(4):88-91.
- [20]严登才. 搬迁前后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实证对比分析[J]. 现代经济探讨, 2011(6):59-63.